

# 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 包容性体制构建研究

Research on Avoiding the Risks of *Middle-Income Trap*  
by Reconstructing Inclusive System

李中建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 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风险的包容性体制 构建研究

李中建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包容性体制构建研究 /

李中建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9

ISBN 978 - 7 - 5141 - 3853 - 5

I. ①规…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体制改革 - 研究 IV. ①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2288 号

责任编辑：白留杰 凌 敏 程辛宁

责任校对：杨 海

责任印制：李 鹏

## 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包容性体制构建研究

李中建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教材分社电话：010 - 88191354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22

网址：[www.esp.com.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bailiujie518@126.com](mailto:bailiujie518@126.com)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21.25 印张 420000 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3853 - 5 定价：4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b>第一章 “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提出</b>	1
第一节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国际背景	1
第二节 我国“中等收入陷阱”的隐忧	5
第三节 以包容性体制构建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8
<b>第二章 包容性所有制结构是构筑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基础</b>	11
第一节 现阶段我国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	11
第二节 我国所有制的演变脉络及包容性所有制结构的形成	18
第三节 当前所有制结构中的问题及国际案例	26
第四节 健全包容性所有制结构 夯实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基础	35
<b>第三章 构建包容性的收入分配制度</b>	41
第一节 收入分配理论的回顾与思考	42
第二节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社会效应	50
第三节 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与形成原因	61
第四节 构建包容性的收入分配制度	75
<b>第四章 构建包容性的就业体制</b>	90
第一节 包容性的就业体制的民生意义	90
第二节 中国当前就业体制存在的问题	98
第三节 构建包容性就业体制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16
<b>第五章 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教育体制</b>	123
第一节 教育与“中等收入陷阱”	123

第二节 基于教育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教训 .....	127
第三节 我国教育的发展历程.....	131
第四节 我国教育发展中的公平问题.....	136
第五节 我国教育的效率问题.....	143
第六节 构建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教育体系.....	147
<b>第六章 包容性增长理念下的金融发展 .....</b>	<b>153</b>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	153
第二节 中等收入国家金融业发展的经验教训.....	157
第三节 我国金融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外部环境.....	167
第四节 开放金融市场 改善我国金融环境.....	174
<b>第七章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b>	<b>186</b>
第一节 自主创新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	186
第二节 国际视角下他国的经验和教训.....	200
第三节 我国自主创新的现状、问题和原因分析.....	210
第四节 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	216
<b>第八章 包容性的城镇化道路 .....</b>	<b>221</b>
第一节 城镇化内涵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	221
第二节 城镇化的支撑体系.....	224
第三节 国外城镇化道路的模式及其特点.....	228
第四节 中国现行城镇化所面临的问题.....	236
第五节 走包容性城镇化道路.....	244
<b>第九章 促进农业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b>	<b>252</b>
第一节 解决“三农”问题对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保障和意义 .....	252
第二节 我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259
第三节 农业现代化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272
第四节 夯实国家安全的农业措施.....	280
<b>第十章 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建设美丽国家 .....</b>	<b>287</b>
第一节 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287
第二节 我国的资源危机及前景.....	293
第三节 我国环境变动趋势.....	299

第四节 国际治理经济、资源环境失调的经验教训	308
第五节 包容性增长战略规避经济增长的生态制约	314
参考文献	321
后 记	334

# 第一章 “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提出

## 第一节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国际背景

据世界银行统计，2010年底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4 0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但与此同时，由于自身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逐渐显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化过程中暴露出一些局部的问题和矛盾，以及国际经济危机的深化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出现了下滑，国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关注。“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成为近一段时间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中国是否会落入类似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该怎样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如何吸取国际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有益经验与教训，等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成为目前中国社会广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各界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运行的强烈渴望，同时也表达了对于长期积累的经济风险与社会矛盾埋伏下潜在危机的深切担忧。

从国际案例来看，一些国家或地区在跨越贫困阶段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并不必然迈入高收入水平国家，相反却出现了原有竞争优势丧失、经济停滞甚至社会动荡的局面。换言之，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并非会自动地迅速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而恰恰是进入了一个易分化点，我们把“中等收入陷阱”界定为当一个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或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在较长时期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其特征一般表现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金融体系脆弱，等等<sup>①</sup>。

经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一阶段都会有特定的困难和问题。客观地说，经济发展的陷阱问题，并非是新近才出现的提法。“马尔萨斯陷阱”揭示

---

<sup>①</sup> 贾凤兰. 中等收入陷阱 [J]. 求是, 2010 (20).

了人类在较低发展水平时期，生活资料增长受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支配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而在食物充足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则呈几何级数增长，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消耗掉人类已经积累的财富，除非人类通过积极的道德抑制，否则就是战争和瘟疫。马尔萨斯的悲观增长预言可以归结为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长，最终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与马尔萨斯模型具有类似结论的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因而必须大规模增加投资，使投资和产出超过人口增长，才能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sup>①</sup>。

中等收入阶段是任何经济体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并非必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据学者的研究，有的经济体实现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较为顺利，在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中进入了高收入国家，人均GDP从1000美元左右增长到10000美元左右，日本用了十五年（1966～1981年），韩国用了十八年（1977～1995年），中国台湾地区也只用了十六年（1976～1992年）<sup>②</sup>。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人均GDP在975美元以下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976～385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856～1190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190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sup>③</sup>。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拉美、中东地区，这些国家自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缺乏持续的竞争优势，大部分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特征较明显的国家如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以推行“进口替代”战略而独树一帜，在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下，出口工业快速发展，该国自20世纪6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GNI）已超过100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20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和美元利率大幅提高的两次外部冲击，该国经济陷入高负债和高通胀的长期停滞局面，1981～1985年该国的GNI分别为2080美元、2000美元、1710美元、1620美元、1570美元，而在1986～1989年分别为1790美元、2040美元、2250美元、2750美元，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处于长期波动甚至停滞状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缓慢上升，2010年GNI为9090美元，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根据科劳弟·卢瑟和安尼尔·索德（Claudio Loser & Anil Sood, 2011）的估计，拉美国家1870～1950年人均GDP增速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增速逐渐与世界拉开差距，1950～1973年、1974～1998年、1999～2008年世界人均GDP年增速分别为2.9%、1.3%和2.8%，而同期拉美国家则分别为2.6%、1.0%和2.1%，经济增速长期下滑甚至出现徘徊情况

① 彭刚、彭忆欧.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与中国对策 [J]. 重庆社会科学, 2011 (10).

② 全毅.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东亚的经验及启示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 (2).

③ 全毅. 东亚模式转型与中国发展道路 [J]. 新东方, 2009 (12).

可见一斑<sup>①</sup>。

为什么一些国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学术界对此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比较优势的丧失。世界银行报告（2006）认为，一些低收入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原有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面临来自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激烈竞争，从而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而在价值链高端上，又无法与发达国家展开知识、技术创新和服务上的有效竞争。蔡昉（2011）从参与国际市场分工的角度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贫穷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中等收入国家均不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在全球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后劲匮乏。姚洋（2011）从产业升级受阻的角度，认为相关国家的居民之间的能力差距拉大，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慢，从而对来自国外技术、装备的适应、学习和创新能力不强，未能实现产业升级，无法应对新的竞争环境。这一观点突出了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协作的重要性，强调了技术进步缓慢并与劳动力、资源价格持续上涨从而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失去原有竞争优势是相关国家落入陷阱的主要因素。

第二，收入差距加大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一些国家出现了收入差距加大，并因此引发了社会矛盾加剧、犯罪问题丛生。其中拉美国家最为典型，其基尼系数普遍超过0.4，而巴西的基尼系数基本上都在0.6的水平。从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0%人口在总体收入中所占有的收入份额来看，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末，巴西为49.1%（1988年），智利为45.4%（1987年），墨西哥为16.9%（1989年），哥伦比亚为41.2%（1988年）；经过20年的演化，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继续呈两极分化态势，仍以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0%人口占份额来看，巴西为42.9%（2009年），智利为42.8%（2009年），墨西哥为38.7.%（2008年），哥伦比亚为45.2%（2008年）<sup>②</sup>。从以农村贫困线衡量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哥伦比亚为46.1%（2011年），玻利维亚为66.4%（2009年），巴拉圭为49.8%（2010年），秘鲁为56.5%（2011年），墨西哥为60.8%（2010年），智利为10.8%（2011年）<sup>③</sup>。

过大的收入差距造成社会的稳定性极差、改革与调整进程放缓、社会各阶层分化加剧和对立情绪增强，群众抗议日益增多、政权更迭频繁和政治局势动荡。

<sup>①</sup> Claudio Loser & Anil Sood. Breaking away from mediocre complacency to a prosperous future.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2011 (3): 5.

<sup>②</sup>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DST.10TH.10?page=4>。

<sup>③</sup>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NAHC/countries>。

同时，强势利益集团必然会寻求对经济的垄断，通过限制其他主体竞争的途径以稳定地获取高额利润，从而使社会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既得利益者通过不断谋求其集团利益，固化甚至加剧了原有的不公平，并使财富、能力、身份等固化和代际继承化，作为下层的普通民众失去了向上流动的能力和机会，社会丧失了公正和正义的基础。

第三，政府治理失灵导致的宏观环境不稳定。中等收入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面对汇率、能源、原材料价格变动等带来的冲击，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政府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的要求更高了，不幸的是，有许多国家陆续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以巴西为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就像脱缰的野马，几乎每年都在三位数以上，甚至高达四位数：1980～1985年的年均通胀率为343%，1986～1989年的年均通胀率为585.9%，严重的通胀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2.2%，其中有五年出现了负增长。不仅如此，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腐败问题较为突出，腐败不仅加大了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成本，加大了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而且加剧了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学者对非洲、亚洲、拉美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61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腐败行为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收入公平均具有显著的副作用，非洲国家的腐败行为对国民收入的副作用最强烈，而拉美国家的腐败行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大，腐败指数每增加10%，会使人均国民收入减少1.7～2.8个百分点，而腐败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收入不平等程度（用基尼系数衡量）增加0.05或0.33<sup>①</sup>，严重的腐败导致了政府公信力下降，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则加剧了阶级矛盾，拉美国家政府频繁更迭、社会缺乏稳定性是其经济起起伏伏的重要根源。这一观点突出了丧失稳定的宏观经济和政治稳定是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停滞和动荡的主要根源。

第四，受外部因素的干扰。发达国家无论是出于在全球确保自己的垄断地位与利益的需要，还是地缘政治的需要，都不太情愿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上附加政治条件，干预和误导相关国家的发展进程。杜传忠、刘英基（2011）认为自由主义加剧了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拉美债务国进行继续投资时，附加了“贝克计划”的条件，要求援助对象推进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这些政策脱离了拉美国家的国情，不仅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还直接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金融危机和阿根廷的高失业率与通胀率，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失败。杨承训（2011）分析了拉美国家受新自由主义

<sup>①</sup> Kwabena Gyimah-Brempong, Samaria Munoz de Camacho. Corruption,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re there Regional Differences?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2006 (7): 245–269.

模式（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影响陷入政治危机，而东南亚国家受美国金融巨头直接插手爆发了 20 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

## 第二节 我国“中等收入陷阱”的隐忧

我国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发展后，也面临着一些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进入了一个各种矛盾的凸显期，如果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政策上不及时调整，则很有可能积聚达到其临界点而爆发社会危机。当前我国虽然出现了增速下滑、增长方式转变慢、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我们不必因为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反而滋生悲观情绪，“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一个必然的规律，我国具有规避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基础和条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为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健的制度框架，从国内外形势看，我国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具有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制度和国情基础，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国际上看，国际经济危机的深化为中国提供了技术跟进和赶超的机会。以虚拟经济泡沫破灭为导火索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虽然美国经济在逐步复苏，但前途仍不明朗，而欧洲发达资本主义的债务危机却不断发酵。国际经济危机固然会给中国的出口造成不利影响，但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也有诸多对我国有利之处：一方面，外需的萎缩所产生的倒逼机制则有助于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逐步降低对经济增长对低端产品出口的依赖；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空心化为我国抓紧引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了较好的机会，有助于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第二，从国情上看，“大国经济”能够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较大空间。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还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劳动力，过去一段时间人们将人口视为包袱，而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和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证明了人口也已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如果再加以持续的教育培训上的投资，我国的人才优势将逐步显现，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人力和智力支持。同时，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容量不断扩大，能够为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较大的增长空间。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可以为产业转移和梯度发展提供机会，正如蔡昉（2010）所指出的，中国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中国可以独立完成若干产业周期的“雁阵模型”产业转移，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的成熟产业可以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实现梯度转移，从而实践“雁阵模型”的国内版本，随着中

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区域间协作与产业继起转移完全可以使大国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

第三，从所处的发展阶段看，持续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英、美等国完成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化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而在新技术不断涌现、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党的十六大报告确立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我们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期间必然会对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产生巨大的需求，成为经济增长强大引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滞后，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而且城镇化很不彻底，我们至少有约1.2亿的农民工及家属在城镇务工居住，但并不享有与城市居民等同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要逐步将稳定转移的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必然会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产生巨大需求，农民工逐步转化为市民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其对消费的贡献将大幅度增加，对扩大内需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第四，从制度上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为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健的制度框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既能充分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防止经济发展速度的大起大落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又提供了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竞争发展的稳定宏观经济环境，有助于不断增强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从政治制度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不仅能够有效地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大局，而且能够及时反映和调整各区域、各民族、各行业之间的利益结构，而反观一些国家陷入动荡的根源，则不仅有收入分配两极化加剧的因素，发达国家助推的“民主运动”、“颜色革命”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最近几年经济发展的态势、结构、动力及改革与发展的分歧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突出性的困难和问题，如果不能保持高度的清醒与警惕，政策调整不及时，则很有可能使各种矛盾积聚达到其临界点从而爆发经济和社会风险。这些风险突出地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速放缓，经济质量低下，赶超型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的风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高于9%的长期增长，但随着传统经济发展的支撑要素消耗殆尽，因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的后发优势逐渐趋于消失，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断扩大，传统的以经济赶超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从国际经验看，大多数经济体经历了或将会经历“结构性增速”和“结构性减速”两个阶段。而前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来源于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迁，正如有学者分析的，无论从要素结构还是从产业结构来看，存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潜力已经基本用尽：劳动投入和劳

动参与率趋于下降，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资源资本化基本结束，资本报酬递减导致资本投入增速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的技术创新面临瓶颈；从产业结构看，随着生产要素向第三产业转移，但第三产业中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行业的效率提高都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sup>①</sup>。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与中国的贸易纠纷与贸易摩擦不断增长，预示着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内需增长尤其是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较相近发展水平经济体贡献度低，而长期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造成了极大的产能过剩，如果不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正面临难以持续的风险。

二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加剧和社会阶层固化风险。我国的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缩小，反而有不断加剧的趋势，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在 0.5 左右，已经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城乡看，1979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 2.53 倍，1983 年降到 1.82 倍，之后持续扩大，2009 年扩大到 3.33 倍；从不同收入群体看，2000 年城镇 20% 的高收入户收入是 20% 低收入户收入的 2.1 倍，2009 年扩大到 5.7 倍，农村由同期的 6.5 倍扩大到 7.5 倍。<sup>②</sup> 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破坏着人们对下一步改革与发展方向的共识，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企业占比过高，居民收入占比较小；资本所有者获得的利润收入较高，而劳动者收入较低。我国的中产阶层比例相对较低，低收入群体过大，而在近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机会和资源已经明显呈向少部分人倾斜和集中的趋势，中低层人群向上流动的空间受阻，社会阶层固化和“阶层复制”的特征日益突出。以高等教育为例，有人对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入学生源进行调查，发现 2010 年高考中全国六成考生来自农村，而在被录取的生源中，清华的农村学生比例只为 17%，北大也不足两成<sup>③</sup>。如果说收入差距拉大是过去积累结果的话，而阶层固化和复制则凸显出中下阶层已经很难向上层社会流动的现实，此种格局一旦固定下来则中下阶层对社会进步的理想将趋于消失，由此造成的社会各阶层之间断裂，孙立平等学者提出，这种社会断裂对社会氛围和社会心态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首先，社会活力大大下降，社会氛围变得日益压抑和沉闷，其次，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最后，普遍的不公平感为部分人的绝望

① 裴长洪. 遵循经济规律，实现稳中求进 [N]. 人民日报，2013-8-7，第 7 版.

② 邱月整理：我们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N]. 光明日报，2013-7-20，第 10 版.

③ 王斯敏等. 超级中学正在垄断一流大学入学资源 [N]. 中国青年报，2011-6-16，第 7 版.

感所取代<sup>①</sup>，所有这些负面情况的积累都会对未来的社会稳定产生冲击作用，近年来我国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也凸显出了社会断裂所蕴藏的风险。

三是，改革滞后的风险。从拉美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来看，一旦改革中的既得利益构筑起稳定的利益集团，必然在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寻求特殊的利益保护，阻挠甚至利用改革的名义增进自己的利益，导致改革变形扭曲，影响社会公正。我国从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遵循了渐进式的道路，较为容易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而攻坚领域的改革进展缓慢，改革的边际收益递减，面临着“高处摘果子”的攻坚困难。从改革的效果和动力来看，前期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各经济主体都会从制度变迁中获取一定的利益增量，而进入攻坚阶段的改革更多地具有利益调整性质，必然要触及甚至要损害局部利益才能推进社会公正，改革中的阻力明显增大，甚至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在减弱。从实践上看，近年来我们在垄断行业改革、公用事业体制改革、房地产调控等问题上措施不少，但进度缓慢、收效不显著，其中就有强烈的既得利益集团干预和阻挠影子。如果攻坚性质的改革推进慢，社会底层的利益诉求无法被重视和尊重，社会凝聚力就会下降，社会稳定堪忧。

四是，“国际捧杀风险”。随着中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二以及中国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杰出表现，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将中国经济发展视为引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引擎，一些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寻求中国政府的支持，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中国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形成一种有意无意地捧杀风气。一方面，国家编造和推销“新兴经济体责任论”、“中国责任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等，要求中国承担起不合理的顺差、汇率、碳排放等过度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又开始利用民主、人权、民族、宗教问题来“妖魔化”中国，企图干扰和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如果我们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忽视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方式和改革滞后等问题，沉迷于经济总量上世界第二大国地位，极容易因盲目自大而步入困局。

### 第三节 以包容性体制构建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通过分析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可以发现，这些挑战和风险从根本上体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不协调、不可持续上，体现为经济发展中的诸多割裂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收入分配风险则易导致社会各阶层割裂和对立；改革滞后风险

<sup>①</sup> 孙立平，“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J]. 开放时代，2012（3）.

体现为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不配套；国际捧杀风险则源于割裂中国实际的发展阶段与国际义务的匹配关系。我们认为，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为应对这些挑战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发。胡锦涛总书记在 2010 年对包容性增长做了进一步阐释，强调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应积极研究如何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转化为实质性的体制构建，通过完善包容性体制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首先是大力推进改革攻坚，形成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针对前期遗留下来的“硬骨头”，大力推进改革攻坚，防止市场经济向“权贵式市场经济”的演化，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消除各种限制非公经济进入的各种“玻璃幕墙”，使国有经济在与其他经济成分竞争协作中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和效益。继续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将垄断行业的产品和服务标准、产量、价格纳入到政府经济规制的框架中，构建合理的公共物品价格形成机制。对土地、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要依据市场价格进行开发利用，对于资源开采、能源利用要通过征收社会成本的方式纠正其负的外部性，抑制对自然资源的低成本过度开发，使资源价格能全面反映其成本。通过包容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为各类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与公平的发展环境，是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其次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更具包容性的收入分配体制。收入分配体制决定了政府、企业、劳动者及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分享程度。要按照民富国强的先后原则，清理和废止不合理甚至重复性的税费，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经济和社会负担，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劳动者维权机制，保障劳动权益和劳动报酬的实现，构建实质性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使普通劳动者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提高劳动报酬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完善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更多地向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和基本住房等民生事业倾斜，积极有为地推进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将更多的人口纳入到政府公共服务对象中，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通过包容性的收入分配体制构建，使普通群众能更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

再其次是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力度，完善更具包容性的人力资源投资体系。教育、培训上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普通人群向上流动的关键因素，为更多的穷人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使其获得就业和致富能力，是包容性增长理念在教育和培训体系上的具体体现。在基础教育环节，政府公共支出和教育资源要进一步向农村、边远地区倾斜，提高毛入学率和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布局的合理化，增加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金、政策支持，减缓中西部地区中等教育的升学压

力。大幅度增加中等职业技能培训经费，为更多的适龄青年提供适应市场需求的技能培训。在企业层面，在确保企业职工培训经费落实到位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税收减免中职工培训经费的比例，引导企业更加重视职工的职业技能培训。通过持续的人力资源开发，为我国的产业升级提供充足的知识和人才保障，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以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为产业结构升级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最后是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完善更具包容性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机制。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状况，直接决定了发展环境的公正与效率，一个法治的、廉洁的和透明的政府，能够最大限度消除社会不公，减少社会摩擦和冲突，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建设法治政府，要从立法、公共事务决策、执法和政务公开、行政监督体系与问责等方面完善法治型政府建设，将政府行为纳入到法律法规范围内。建设廉洁、透明政府，始终将党的建设与廉洁型政府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土地征用、城市市容管理、司法判决与执行等方面严格依法办事，大力促进人性化执法，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建设亲民政府，和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从源头上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 第二章 包容性所有制结构是构筑 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基础

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中心环节，决定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支配和收益归属问题，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包容性的所有制结构，为各类经济主体平等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公正和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提高，奠定了制度基础。本章从所有制结构入手，分析包容性所有制结构对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并结合国际上的经验教训提出完善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现阶段我国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包含内生结构和外生结构。内生结构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这些权利既可以统一起来，也可以相互分离；外生结构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各种所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单一所有制，还是多种所有制并存或混合发展。

####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

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构成社会制度的基础，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则是经济制度的基础。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有这样的表述，“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下定义，不外乎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由此可见，所有制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在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该社会的所有制结构。每一个社会形态总有一种所有制形式处